

## 南宋乾淳文制變遷與辭賦風尚

許 結

### 摘 要

南宋孝宗朝的乾道、淳熙年間，因朝廷隆文政策的取向，一時文學彬彬之盛，被史家稱之「小元祐」，而辭賦創作也隨著文制的變遷，特別是對科舉考賦的歸復與推崇，成為繼宋初殿試辭賦、元祐恢復考賦而出現的又一賦學隆興的歷史階段。在這一階段，由於科舉考賦的宣導，辭賦風尚出現了兩大明顯走向：一是對律賦的重視，在文人筆下出現了大量的律賦創作，成為南宋律賦創作的代表；二是對辭賦創作典範的塑造，其中又包涵了兩個方面：一則追溯當朝歷史，樹立了歐（陽修）、蘇（軾）賦的創作典範；一則當時科場律賦的大量創作，又為後世樹立了頗有時代特色的諸如陳傅良、樓鑰等人律賦創作的典範，堪稱賦壇之「乾淳體」。南宋後期因賦家對乾、淳遺老律賦創作的心摹手追，又形成辭賦批評求適於文場的應用性之一翼，而與文人賦批評出現對待與分離的態勢。

關鍵詞：乾淳、律體、批評、文制變遷、辭賦風尚

---

2012/04/12 投稿，2012/06/20 審查通過，2012/07/01 修訂稿收件。

\*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「中國辭賦理論通史」(09BZW073)、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資助項目「科舉文化與辭賦文學傳統研究」的階段成果。

\* 許結現職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## The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System in the Years of *Qiandao* and *Chunxi* and the New Tendencies of *Fu*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

Xu Jie

### Abstract

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emphasizing on literary writings, the years of *Qiandao* and *Chunxi* in the Southern Song are compared by historians to the years of *Yuanyou*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. *Fu* revives and flourishes during the years of *Qiandao* and *Chunxi* because it is reinstated as an ite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. Two apparent new tendencies emerge: an emphasis on the *lüfu* (regulated *fu*)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*Qian-Chun* style. The *Qian-Chun* style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Ou style (Ouyang Xiu's style) and the Su style (Su Shi's style) in the Northern Song, and the style of the writers then, such as Chen Fu-liang and Lou Yue. *Lüfu* works in this period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is gen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.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, the imitation of the *Qian-Chun* style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a new type of *fu* criticism, which especially opposes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criticism and stresses on the pragmatic value of *fu*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.

Keywords: *Qian-Chun*, regulated *fu*, criticism, changes of the cultural system, tendencies of *fu* writing

---

\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,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.

宋代文學發展到南渡後的孝宗朝，因「隆興和議」結束了宋、金間的戰爭，社會出現了乾道、淳熙二十餘年的穩定與繁榮，伴隨著文化的發展，文學也出現了史稱的「中興」新局，其文風被譽之「小元祐」，文體謂之「乾淳體」。考諸家評述，如楊萬里《誠齋詩話》云：「自隆興以來，以詩名者，林謙之，范至能、陸務觀、尤延之、蕭東夫。近時後進有張鑑功父、趙蕃昌父、劉翰武子、黃景說岩老、徐似道淵子、項安世平甫、鞏豐仲至、姜夔堯章、徐賀恭仲、汪經仲權，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。」<sup>1</sup>此論詩學中興，其中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、尤（袤）與作者（楊萬里）合稱詩壇「中興四大家」。又如吳資深《進曾祖吳徹文集表》云：「載觀乾、熙之間，實號人物之盛。朱熹鳴于古歙，張栻顯于長沙，浙左二呂之典刑，江西兩陸之標緻。靡不相友，咸與齊聲。」<sup>2</sup>此論學術中興，兼明性理文章。然於辭賦創作之「中興」，以及其時創作風尚與文制變遷之關聯，殊無深究。故試為辨析，企明大略。

### 一、文制：賦荒與拯救

南宋時期的辭賦，特別是乾淳「中興」期的創作，筆者曾以〈騷情與哲理的融織〉為題，<sup>3</sup>並舉楊萬里與朱熹賦作為例，用以彰顯其義。這實際上是專就當時「文人賦」所言，並未包括科舉「應試賦」（亦稱棘闈賦），而在現有幾種賦史中，惟鈴木虎雄的《賦史大要》頗關注於此，有「宋太宗試賦」、「真宗試賦」、「宋試賦之趨勢」諸目，<sup>4</sup>然亦僅述北宋史事，未及於南渡後情景。然作為科舉文戰的「應試賦」，雖不能代表當代辭賦創作的水準，但對辭賦創作興衰之影響及作用，實不可低估。緣此，劉克莊曾比較唐、宋詩賦取士云：「唐世以賦詩設科，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詩，故唐人詩工而賦拙。……本朝亦以詩賦設科，然去取予奪一決於賦，故本朝賦工而

<sup>1</sup>〔宋〕Song 楊萬里 Yang Wanli:《誠齋詩話》Chengzhai shihua, 丁福保 Ding Fubao 輯:《歷代詩話續編》Lidai shihua xubian 本(北京[Beijing]: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, 1983年)。

<sup>2</sup>引自《詔宋樓藏書志》Bi song lou cang shu zhi 卷84。按:程敏政 Cheng Minzheng:《新安文獻志》Xin an wen xian zhi 卷41文題作〈進曾祖徹竹洲文集表〉“Jin zeng zu jing zhu zhou wen ji biao”。

<sup>3</sup>許結 Xu Jie:〈騷情與哲理的融織——南宋辭賦藝術初探〉“Saoqing yu zheli de rongzhi——nansong cifu yishu chutan”,《南京大學學報》Nanjing daxue xuebao 1995年第1期,頁71-76。

<sup>4</sup>〔日〕鈴木虎雄著,殷石暉 Yin Shiqu 譯:《賦史大要》Fushi dayao (南京[Nanjing]:正中書局[Zhengzhong shuju], 1942年),第334、336、338頁。

詩拙。」<sup>5</sup>然則劉氏亦僅就科場去取予奪與賦之「興」，而未及宋世科場兩度罷禁詩賦而出現賦之「衰」，考察南宋乾、淳時期辭賦創作的中興局面，恰在繼兩度科場「罷賦」造成之「賦荒」後的拯救與復興，這是為人忽略的一個歷史視點。

對宋代科舉考試制度的變遷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有云：

熙寧四年始罷詞賦，專用經義取士，凡十五年。至元祐元年復詞賦，與經義並行。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，專用經義，凡三十五年。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、賦。蓋熙寧、紹聖，則專用經而廢賦；元祐、建炎，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。<sup>6</sup>

這段文字記述的是北宋後期「熙寧罷賦」與「紹聖罷賦」兩段史事，也是宋朝文制變遷落實於科場的重要事變。

「熙寧罷賦」源起王安石神宗熙寧2年所上《乞改科條制》之提議「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，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」，理由是當時科制「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，苟尚文辭，類皆小能者為之」（《取材》）。<sup>7</sup>同年，韓維也上請進士科「罷詩賦，各習一大經，問大義十道」。<sup>8</sup>往前追溯，仁宗朝安逸處士何群於嘉祐4年已有上言提議科場罷賦：「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，請罷去。」<sup>9</sup>英宗朝司馬光於治平元年上《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》言：「今來呂公著欲乞科場更不用詩賦」，可見其時已有呂公著罷詩賦之請。只是這醞釀已久的罷賦之請，至王安石變改文制始施行，即熙寧3年殿試「始策進士，罷詩、賦、論三題」、4年「禮部試進士，罷詩賦」（《宋史·神宗紀二》）。在議罷詩賦時，亦多反對意見，如蘇軾上《議學校貢舉狀》就以「自唐迄今，以詩賦為名臣者，不可勝數，何負於天下，而必欲廢之」質疑。

<sup>5</sup> [宋] Song 劉克莊 Liu Kezhuang:《後村先生大全集·李耘子詩卷》*Houcun xiansheng daquanji: Liyunzi shijuan* (北京[Beijing]: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[Guojia tushuguan chubanshe], 2004年)卷98, 頁1056。

<sup>6</sup> [元] Yuan 馬端臨 Ma Duanlin:《文獻通考·選舉考五》*Wenxian tongkao: Xuanjukaowu* (清浙江書局本)卷32。

<sup>7</sup> [宋] Song 王安石 Wang Anshi:《臨川集·乞改科條制》*Linchuanji: Qigaike tiaozhi* (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)卷42。

<sup>8</sup> [宋] Song 王應麟 Wang Yinglin:《玉海·熙寧議貢舉學校制》*Yuhai: Xining yigongju xuexiao zhi* 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卷116。

<sup>9</sup> [宋] Song 李燾 Li Tao: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卷190。

而罷賦與否的爭議焦點，則重在經義與詞章問題，於是哲宗朝科場「元祐復賦」，表現了對二者關係的調和，即分立「經義」與「詩賦」進士。「元祐復賦」源起元祐元年高太后臨軒問政，質疑新法，侍御史劉摯議貢舉，反對王安石新經、字說，主張恢復詩賦取士，提出「詩賦之與經義，要之，其實皆曰取人以言」，<sup>10</sup>朝廷於次年（元祐2年）實行進士科第二場試律賦一道，至元祐7年採納左正言姚勳提議「並立詩賦、經義各一科」，至此始分「詩賦」、「經義」兩科進士，且沿為南宋科舉定制。

針對「熙寧罷賦」的「元祐復賦」，回到前引馬端臨的記述，有兩點需要辨析：一是「熙寧四年始罷詞賦」指的是禮部試，殿試於前一年已專用策而罷賦，且沿為定式，所以詩賦罷復之爭後全歸於禮部試。二是科場專用經義「15年」，指的是從「熙寧4年」（1071年）到「元祐元年」（1086年），然考諸史實，元祐元年議復賦，2年（1087年）始施行，故其間罷賦當為「16年」。然而，從「元祐復賦」到紹聖元年（1094年）哲宗親政再罷詩賦（「紹聖罷賦」），其間又僅8年，其中鑒於停賦多年，蘇軾於元祐3年上《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》以調解缺少詩賦試官問題，5年，孫諤等言「《貢舉條》詩賦格式有所未盡」，<sup>11</sup>以濟補考試字、韻不諧問題等。也正因這短短8年的科場復賦是對前此16年「罷賦」而造成「賦荒」的制度化的糾正，故其治賦思想的反省亦具有拯救意識，這突出表現於兩方面：

其一，以「經」濟「賦」，營造以「賦」之博學拯救專「經」而廢經學的態勢。如劉摯元祐元年上奏主張科場復賦云：「詩賦命題，雜出於六經、諸子、歷代史記，故重複者寡。經義之題，出於所治一經，一經之中可為題者，舉子皆能類聚，哀括其類，預為義說。」<sup>12</sup>這種思想在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8的表述，則更為激切：

熙寧以前，以詩賦取士，學者無不先遍讀《五經》，余見前輩無科名人，亦多能雜舉《五經》，蓋自幼習之爾，故終老不忘。自改經術，人之教子者，往往便以一經授之，他經縱讀，亦不能精。<sup>13</sup>

<sup>10</sup> 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卷368。

<sup>11</sup> 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卷445。

<sup>12</sup> 〔宋〕Song 劉摯 Liu Zhi:《忠肅集·論取士並乞複賢良科疏》*Zhongsuji: Lunqushi bingqi fu xianliangke shu* (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) 卷4。

<sup>13</sup> 〔宋〕Song 葉夢得 Ye Mengde:《石林燕語》*Shilin yanyu* (明正德楊武刻本)。

科舉考文，童蒙幼習維繫於此，文制一變，修習全改，銓選之需，很大程度決定士子由幼及長的修學途徑。而賦有用於科場，要根據命題逞才炫學，特別是經義題之「熔經鑄典」，尤非熟讀《五經》不可為。這種思想在南宋建炎復賦後一直影響科場文戰，如慶元 4 年以經義命賦題，除在《六經》中出全題外，還從三篇中摘句合出一題，所以臣僚上言贊曰：「今之詩賦，雖未近古，然亦貫穿六藝，馳騁百家，有駢四儷六之巧。」<sup>14</sup>以駢儷之巧文而得貫穿六藝之實學，正是科場賦之典範。

其二，「荒賦」即荒廢了詞章之學，而自興科舉以來，「以文取人」為之根本，恢復考賦也就具有彰顯文學傳統的意味。換言之，元祐 2 年經過第一次罷賦 16 年後復賦，不僅舉子疏於此道，試官也難以勝任。為了準備考賦，不僅需要由禮部立《詩賦格式》，還要尋訪通辭賦的老師充為教官，培育舉子習賦。最典型的是元祐 3 年左正言丁鷟上奏章云：

竊睹明詔，欲於後次科舉以詩賦取士，天下學者之幸也。然近時太學博士及州郡教授，多緣經義而進，不曉章句對偶之學，恐難以教習生員。臣愚欲乞下兩省、館職、寺監長貳、外路監司各舉二人曾由詩賦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，以充內外教官。蓋經義之法行，而老師宿儒久習詩賦，不能為時學者，皆不就科舉，直候舉數應格，方得恩命。今或舉以為教官，當能稱職。<sup>15</sup>

其因罷賦而荒廢詞章之學的嚴重程度可見。元祐 5 年，上官均針對《貢舉條制》以詩賦定去留，亦感歎「詞賦之學，最為難工，治平以前，學者久習，精者猶鮮」。<sup>16</sup>緣於科舉試目關係到舉子的修習與前程，學者對科場罷賦與復賦非常慎重，如治平 3 年司馬光上《貢院定奪科場不用詩賦狀》提出「今若罷去詩賦，仍乞依呂公著起請，預行告示，使天下學者早得聞知」；元祐元年蘇轍贊成劉摯議貢舉復詩賦，但主張以防混亂，元祐 5 年科考再議，<sup>17</sup>都是對舉子修習不能銜接考場文戰的擔憂。

<sup>14</sup> [清] Qing 徐松 Xu Song:《宋會要輯稿·貢舉雜錄》*Song huiyao jigao: Gongju zalu* (中華書局 1957 年影印本) 卷 5 之 20。

<sup>15</sup> 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卷 409。

<sup>16</sup> 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卷 499。

<sup>17</sup> [宋] Song 蘇轍 Su Zhe:《樂城集·言科場事狀》*Luancheng ji: Yan kechang shizhuang* (四部叢刊景明嘉靖蜀藩活字本) 卷 37。

從熙寧罷賦到元祐復賦，其間僅十六年，已造成如此的「賦荒」，並激發起如此的思想反彈，那麼從紹聖元年（1094年）罷賦再到南宋高宗建炎2年（1128年）依《元祐法》恢復以詩賦、經義兩科取士，其間已歷35年之久，因罷賦而造成的「賦荒」更非前者可比。因此，由建炎到紹興的30年間，考試制度及方法雖多爭議，從總體上看只是科場試賦的恢復期，直到乾、淳時期方成興盛局面。而由乾、淳科場與文壇追溯元祐考試的8年光景，雖在考試史上僅「曇花一現」，但因介乎兩次「賦荒」之間，其科場賦與文人賦都顯得彌足珍貴，乾、淳「小元祐」賦作家對「元祐賦」的追摹與推尊，誠為歷史之必然。

## 二、律體：經義與時政

如何看待乾、淳朝「小元祐」的賦壇中興，雖然我們不能忽略如陸游、楊萬里、朱熹等人的「文人賦」創作，但由於南宋時代延續了長期的科場考經義或考詩賦之爭，尤其是前述的因罷賦而造成的兩度「賦荒」，科場文制所代表的朝廷文化政策對士子命運的決定，更能體現當時賦壇「中興」的價值與意義。儘管南宋初建炎2年已恢復考試，然歷經紹興仍未完備，以致士子對賦體的掌握顯得生疏、粗鄙。如紹興26年因舉子不習科場賦體，詔令國子監印造《禮部韻略》以為規範，又有議歸復合經義與詩賦為一科，高宗加以反對，一在恐舉子「無所適從」，一在如紹興31年臣僚奏言：「經義、詩賦合為一科，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，不合聲律；後生習詩賦者，不能究經淵旨，場屋之內，病於偏枯。」<sup>18</sup>至於孝宗朝如何改變士子文場「偏枯」之弊，我想引兩則文獻以為旁證。

一則是南宋理宗淳祐初鄭起潛上奏所編科場八韻賦格《聲律關鍵》，卷首有鄭氏筭子：「起潛屢嘗備數考校，獲觀場屋之文，賦體多失其正。起潛初仕吉州教官，嘗刊賦格，自《三元衡鑒》、二李及乾、淳以來諸老之作，參以近體古今奇正，萃為一編。」<sup>19</sup>所言「乾淳以來諸老」，指的就是孝宗朝改變文制所出現的考場律賦的典範。

<sup>18</sup> 引自《宋會要輯稿·舉士》*Song huiyao jigao: Jushi* 卷4之32、4之34。

<sup>19</sup> 〔宋〕Song 鄭起潛 Zheng Qiqian：《聲律關鍵》*Sheng lü guan jian* 卷首，〔清〕Qing 阮元 Ruan Yuan 輯：《宛委別藏》*Wan wei bie cang* 本（南京[Nanjing]：江蘇古籍出版社[Jiangsu guji chubanshe]，1988年）。

另一則是姚勉於淳祐 12 年論賦體在科場考試中的地位云：「國初殿廷惟用賦取狀元，有至宰相者，賦功用如此也。」<sup>20</sup>這指宋初殿試考試，強調賦的事功精神。而姚勉卒後，胡仲雲撰《祭雪坡姚公文》又評姚氏科場文謂「人皆謂之雪坡、子瞻，以其文之驅濤湧泉，怒罵嬉笑，皆成章篇，日與筆硯以相研；人皆謂之雪坡、同父，以其氣之靈駕風鞭，豪放凌厲，自視無前，取高科如騫」，其中引述「子瞻」、「同父」（陳亮），實喻指「元祐」與「乾淳」之歷史，加上姚氏「國初」之說，正好隱寫出宋代士人科場作賦追慕「高科」而取法的三個重要階段，即國初殿試賦、元祐復賦與乾淳興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熙寧罷賦以前，科場文體之爭主要在考「策」、「論」與考「經」、「賦」之爭，其中包涵的是「策」、「賦」之爭，而重「策」為一時風尚。如仁宗朝天聖 5 年貢院取士「參考策、論以定其優劣」，<sup>21</sup>慶曆 4 年宋祁等上言主張策論大義，有詔令「進士試三場，先策，次論，次詩賦」，<sup>22</sup>一改首場試詩賦的慣例，策、論（尤其是策）在科場地位得到提升，也正與此思想適應。宋初殿試賦極重時事與器識，沈作喆《寓簡》引述宋太宗淳化 3 年進士孫何《論詩賦取士》云：「唯詩賦之制，非學優才高，不能當也。……觀其命句，可以見學殖之淺深；即其構思，可以覘器業之大小。」歐陽修《歸田錄》亦謂：「真宗好文，雖以文辭取士，然必視其器識。」其「學殖」與「器識」成為宋初帝王、儒臣、文士對應制律賦的共同要求，從而使清麗芊綿的律體轉向典重莊雅。例如李調元評范仲淹律體《用天下心為心賦》中「審民之好惡，察政之否臧」一段謂「此中大有經濟，不知費幾許學問，才得此境界，勿以平易而忽之」（《賦話》卷 5）。直到神宗熙寧新法施行，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而罷賦，始將科場爭議中心轉向「經」與「賦」，於是考試如何適應經義，經義如何排斥詞賦，又成為「元祐復賦」與「紹聖罷賦」的重要命題。

承繼上述複雜的文制變遷與科場考文的矛盾，乾、淳之世以科場律賦為代表的賦學中興，其意義就在如何以崇尚詞章、聲韻的律賦形式，兼融經義之學理與策論之時政、器識，為南宋科舉提供了一種創作的範式。據

<sup>20</sup> [宋] Song 姚勉 Yao Mian:《雪坡舍人集·詞賦義約序》*Xuepo sheren ji: Cifu yiyue xu* (民國豫章叢書本) 卷 38。

<sup>21</sup> 《宋會要輯稿·科舉條制》*Song huiyao jigao: Keju tiaozhi* 卷 3 之 15。

<sup>22</sup> 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 卷 147。



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記述，孝宗御試進士時言：「時儒生迭興，辭章雅正，號『乾淳體』。」<sup>23</sup>這顯然指「太學」時文，而進士賦也是其中的重要義項。當時有名於場屋者甚眾，當時的絕大多數詩賦及文章大家皆科舉出身，諳習進士賦體，其中尤以陳傅良、袁樞、樓鑰等場中名聲最為顯著。如陳氏「用詞賦取科第，詞賦與進士詩為中興冠」；<sup>24</sup>袁氏「嘗以〈修身為弓賦〉試國子監，周必大、劉珙皆期以為遠大器」；<sup>25</sup>樓氏「隆興癸未省試考作賦魁，以犯諱當黜，知舉洪遵奏收置三甲首」。<sup>26</sup>陳傅良賦雖為「中興冠」，惜作品散佚，現僅存騷體〈戒河豚賦〉1篇，而進士律體則有〈漢鑿雕為樸賦〉殘句存於孫奕《履齋示兒篇》卷9：「吏尚刻深，弊見於元封、元鼎；意多穿鑿，機形於五鳳、黃龍。」

相比之下，樓鑰《攻媿集》存律賦14篇，多用經史題以寓時政，偶詞工麗，深明經義，闡發議論，堪稱當時文場典範。例如經題，其〈修身以為弓賦〉（以「修身為弓，發必中矣」為韻）開篇破題云：

學貴務本，志當適中，惟修身而由道，遂取喻以為弓。正以不他，曲盡筋躬之術；張而弗弛，自成中之之功。士有該百行以研窮，端一心而折衷。謂存於吾者，苟不知審；則發於外者，何以示眾？今也見聖師而由聖，當明四重以四輕；猶弓人之為弓，要在百發而百中。<sup>27</sup>

此論儒門倫理之道與修身之行，不僅對偶精工，於經義也不無發明，具有拯世與濟世的現實意義。其〈子使漆雕開仕賦〉（以「開未從仕，聖人使之」為韻）中段有議論云：

噫！有帝王之學者，使之為邦；在言語之科者，使之辭命。苟非此子之善學，安得發言於將聖。今也師以為可，而猶切於退托；道既未成，則尚資於涵泳。志有同於曾點，姑樂舞雩；藝或及於

<sup>23</sup> 《文獻通考·選舉五》*Wenxian tongkao: Xuanju wu* 卷32。

<sup>24</sup> 〔宋〕Song 葉紹翁 Ye Shaoweng：《四朝聞見錄·止齋陳氏》*Sichao wenjian lu: Zhizhai chenshi*（清知不足齋叢書本）卷1。

<sup>25</sup> 〔清〕Qing 李調元 Li Tiaoyuan：《賦話》*Fuhua* 卷10引《困學紀聞》*Kun xue ji wen*（清涵海本）。

<sup>26</sup> 〔清〕Qing 浦銑 Pu Xian：《歷代賦話續集》*Lidai fuhua xu ji* 卷10引《直齋書錄解題》*Zhizhai shulu jieti*。

<sup>27</sup> 〔宋〕Song 樓鑰 Lou Yao：《攻媿集》*Gong kui ji* 卷80，武英殿聚珍版。

冉求，始當從政。彼有求價而沽者，賜亦陋矣；干祿而學者，師何過哉！豈若此心不求於爵祿，跡寧滯於蒿萊。

此中化用《論語》言語，而論為學從政之道，巧妙化用其中人物事典，點破孔子「因材施教」的人才觀與「舞雩之樂」的人生境界，既現實致用，又典雅脫俗。

又如史題，其〈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〉（以「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」為韻）開頭寫道：

炎德繼統，漢光得時。惟乘龍而特起，以御天而有為。獨收興復之功，系隆丕祚；蓋際飛騰之會，統制方維。

由「史」及「今」，賦中從第二段寫「光武中興之功」，也轉筆於第三段的當時形勢，所謂「今我恢宏圖之糾糾，濟大業之兢兢。既當陽而有造，宜取象於時乘」，表達了意欲光復中原的「中興之業」。其〈擊楫誓清中原賦〉（以「渡江擊楫，誓清中原」為韻）寫晉室祖逖北伐故事，史事是「典午中衰，永嘉南渡」，史狀是「戰塵久滿京師，突騎交馳洛汭」，而隨著賦筆的展開，歷史的想像空間已與現實的社稷版圖疊映，作者在賦的收束處寫道：

果能扶神器之阡危，拯遺黎之沈溺。長淮以北也，復見夫冠帶；大河以南也，悉除夫荆棘。……方今矯矯虎臣，皆欲濟河而焚舟，下視祖生之事業。

雖然南宋孝宗朝的政治和平與文化中興源於「隆興和議」，具有苟安性質，但賦家在讚美其中興安寧時局，總是不忘「靖康之恥」而伸光復中原之志，誠如樓氏另一篇〈受降如受敵賦〉（以「受降之際，亦當嚴備」為韻）所言「蓋念犬戎之難信，深恐狼心之或欺。與其有變而無備，孰若居安而慮危」，應試律體，也不乏關心時政的抗顏諍言。賦史研究家對南宋中期的具有愛國寓意的賦多關注如陸游的〈豐城劍賦〉、范成大的〈館娃宮賦〉、楊萬里的〈海鱸賦〉等場外文人賦創作，<sup>28</sup>殊不知當時科場應試律賦也不乏這樣的精神與氣骨。

樓鑰的科場律賦內容廣泛，有如〈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〉之頌漢，〈修身以為弓賦〉之善養，〈孟荀以道鳴賦〉之體仁，〈本強則精神折衝賦〉之

<sup>28</sup> 參見馬積高 Ma Jigao：《賦史》Fushi(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古籍出版社[Shanghai guji chubanshe]，1987年)，第十章第六節〈南宋中、晚期〉“NanSong zhongwanqi”，頁459。

尚賢，〈受降如受敵賦〉之憂患，〈濟河焚舟賦〉之凜然，〈簞食壺漿迎王師賦〉之明德，〈子使漆雕開仕賦〉之勵志，〈歲星所在國有福賦〉之禎祥，〈高祖好謀能聽賦〉之治道等，然其無不寓含經義，影寫史事，明辨時政，抒發議論，使經義與時政、詞章有機結合在一起，這既是他的制勝文場且為人效仿的原因，也是其創作適應當時文制變遷而形成的風格。

以樓鑰科場律賦創作為個案，同樣可以看到當時文制變遷帶來的賦風轉變，這落實於科場文戰，有兩點最為突出：一是賦文干預時政，較以往賦家寄諷而主婉言譏諫不同，更顯得直白，這與宋人好議論有一定的關聯。試觀李調元《賦話》引錄的一則故事：<sup>29</sup>

孝宗時，上庠試卷，時經御覽。辛丑大旱，七月秋試〈閔雨有志於民賦〉，<sup>30</sup>魁士劉大譽。賦中有「商霖未作，相傳說於高宗；漢旱欲蘇，烹羶羊於孝武」之句，時趙溫叔為相，孝宗遂欲罷之。會有詔，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，有為詩者曰：「走殺東頭供奉班，侍宣聖旨到人間。太平宰相堂中坐，天竺觀音卻下山。」溫叔聞之，遂乞免。

此雖具有遊戲味道的傳說，但宋代「言官」類似漢代「天官」有彈劾官員之職，且常於詩賦中體現其功能，這才有導致孝宗因之罷免宰相的說法，這其間與試賦出入經義而善發議論，針砭時弊的關係，是耐人深思的。二是科場時文也講求「士氣」，強調賦格之高下，這也是乾、淳時期文壇中興的一個特色。陳亮於乾道5年2月撰《變文格》縱論有宋文制，其於北宋末到南宋中有言：

紹聖、元符以後，號為紹述熙（寧）、（元）豐，亦非復其舊矣。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，其間可勝道哉？中興以來，參以詩賦經術，以涵養天下士氣，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，故士之有文章者，德行者，深于經理者，明於古今者，莫不各得以自奮，蓋亦可謂盛矣。<sup>31</sup>

<sup>29</sup> [清] Qing 李調元 Li Diaoyuan:《賦話》Fuhua 卷10引〈偶雋〉。

<sup>30</sup> 按：[清] Qing 浦銑 Pu Xian:《歷代賦話續集》Lidai fuhua xu ji 卷10引《齊東野語》Qidong yeyu 賦題中「於」字作「乎」。

<sup>31</sup> [宋] Song 陳亮 Chen Liang:《龍川集·變文法》Longchuan ji: Banwen fa 卷11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。

這與孝宗意欲中興文壇的思想旨意一致。淳熙 6 年冬，孝宗論科場取士之道云：「朕觀劉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，前後論之者多矣，皆未為切當。今因論此一節，極言其弊，亦激士氣之一端爾。夫近世取士莫若科場，及至用人，豈可拘此？詩賦經義，學者皆能為之，又何足以分重輕乎？夫科場之弊，不精考文格之高下，但以分數取之，直幸與不幸爾。」<sup>32</sup>這種高揚「士氣」，將科場之文格推擴於場外之文風，自然也影響到當時場屋內的文風與賦格。

### 三、經典：追摹與擬效

回到南宋乾、淳時期的文制變遷對賦風的影響，有幾大要素值得考述：一是帝王重視，將賦納入中興文治範疇。最典型的事就是乾道 4 年正月，宋孝宗御制〈春賦〉一章賜洪邁，邁作跋語論帝王之文云：

古今能文者多矣，惟廣大高明，開闔造化，然後足以為帝王之文章；帝王之文多矣，惟經天緯地，鼓舞動植，然後足以盡聖人之能事。<sup>33</sup>

洪邁文中雖多頌聖之諛詞，但其所言帝王對一代文風造就的作用，是符合集權政治下文化建設與發展之史實的。而孝宗本人對他自撰的〈春賦〉的敦本勤農內涵及示範群臣的意義，也是極為重視的。如高斯得記述：「乾道四年二月庚子，孝宗皇帝出御制〈春賦〉以示大臣，言農事方興，要使無失其時，蓋與〈七月〉之詩相為表裏。……是時講解初定，域中晏然，時和歲豐，百姓安樂，而孝皇留意民事如此，其後乾、淳二十年間，阜康之美比跡成康，猗歟盛哉！」<sup>34</sup>而結合淳熙 6 年孝宗親撰〈科場取士之道論〉、

<sup>32</sup> 引見〔宋〕Song 史浩 Shi Hao：《鄮峰真隱漫錄·回奏宣示御制策士聖訓》*Maofeng zhenyin manlu · huizou xuanshi yuzhi ceshi shengxun* 卷 10，見舒大剛 Shu Dagang：《宋集珍本叢刊》*Songji zhenben congkan*（北京[Beijing]：線裝書局[Xianzhuang shuju]，2004 年）第 43 冊。

<sup>33</sup> 〔宋〕Song 洪邁 Hong Mai：〈跋御制春賦〉“Ba yuzhi chun fu”，見〔宋〕Song 王應麟 Wang Yinglin：《玉海》*Yuhai* 卷 31。

<sup>34</sup> 〔宋〕Song 高斯得 Gao Side：《恥堂存稿》*Chitang cunghao* 卷 3，〈跋黃給事鈞所藏孝宗皇帝御制〉“Ba Huangjishi Jun suocang Xiaozonghuangdi yuzhi”（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）。按：或謂孝宗 Xiaozong 〈春賦〉“Chunfu”由徐本中 Xu Benzong 校訂、修飾。張端義 Zhang Duanyi：《貴耳集》*Guier ji* 卷上：「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……曾作〈春賦〉有云：『予將觀登臺之熙熙，包八荒之為家。穆然若東風之振稿，灑然若膏雨之萌芽。生生之德，無時不佳，以何羨乎炫目之芳華。』」示徐本中，命其校訂。曾觀因譚徐云：『上

13年洪邁等奏請科場賦限360字，以免失之支離、冗長，並謂「竊見近年舉子程文，深弊日甚，固嘗深軫宸慮」，<sup>35</sup>均可見孝宗自覺振興文風，且與場屋文制有密切關聯。

二是對科場考賦工具書的重視與修訂，其中尤以「程文」樣式示士子以津筏，對乾、淳以詞章明經義而通時務的科舉賦風的形成，亦切實相關。當然，程文強求技巧，所以當時對考賦的要求，也非常細微。例如乾道5年詔從禮部貢院所請，於《禮部韻略》「隨」字下注明亦作「隋」，<sup>36</sup>7年起居郎留正奏乞精校太學程文，並謂：

今次太學見引公試，伏望明詔主司，精加考校，詩賦取合律，經義求得體，論策以記問該博、議論淵源者置之上游。庶幾傳佈四方，士子知所適從，于時政亦有所補。<sup>37</sup>

此論詩賦、經義、策論各准其例，著重強調「于時政」有所補益，並非僅指其對政府文制的建設作用，還應包括程文皆宜關切時政為要。又如淳熙5年知貢舉官范成大等奏議「忼」、「恍」二字並通，修入《禮部韻》內，<sup>38</sup>上皆從之。這些雖然均事屬瑣碎細微，然因關乎科場舉子考賦優劣品級，故而受到極度重視。

三是唐宋科場素有北人重經、南人尚文的偏向，乾、淳科場賦風中興，實與其時東南政治文化主導地位之完成相關。《宋史·選舉志》記述理宗紹定4年臣僚言乞戒飭漕臣嚴選考官，有謂「地多經學，則博選通經者；地多賦學，則廣致能賦者。主文必兼經、賦，乃可充其職」。這說明考官的學問專精與否對取士的影響至大。然自中、晚唐以來，南方科場舉子就多尚詩賦，形成北方重經，南方重賦的局面，這落實到乾、淳科場，則是禮部多次上奏為「詩賦科」爭取更多的發解額以及對考賦的重視。虞集曾論南宋中興文風云：「乾、淳之間，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。若益公之溫雅，近出於廬陵；永嘉諸賢，若季宣之奇博，而有得於經；正則之明麗，則不失其正。彼功利之說，馳騁縱橫其間者，其鋒亦未易嬰也。文運隨時，

〈春賦〉，本中在外言曾為潤色。」壽皇頗不悅。」

<sup>35</sup> [清] Qing 徐松 Xu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·選舉》*Song huiyao jigao: Xuanju* 卷5之10。

<sup>36</sup> [清] Qing 徐松 Xu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·舉士》*Song huiyao jigao: Jushi* 卷4之40。

<sup>37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38</sup> [清] Qing 徐松 Xu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·貢舉雜錄》*Song huiyao jigao: Gongju zalu* 卷5之4。

而中興概可見焉。」<sup>39</sup>虞氏之說雖仍囿於經學思維，然以「溫雅」、「奇博」、「縱橫」諸詞語描繪乾、淳文壇氣象，則頗切合。然其中不可忽略者，在於南宋至孝宗朝，南渡後挾裹之北方文勢趨變，東南文風已占主流，推尊詩賦在科場文戰中的作用，實含地域風尚。以致元人修史，如《宋史·尹穀傳》謂：「宋以詞賦取士，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。」<sup>40</sup>

而將文制之變引入賦風之變，又在創作的效擬，這就是賦文經典的樹立與重塑。如前所言，宋代自紹聖後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 40 年，<sup>41</sup>由於長時期的科場程文中「賦」的缺席，從童蒙修習到「進士」文戰，均無關注於賦者，而其所造成的「賦荒」使恢復考賦後的士子無所取法，於是在北宋兩度罷賦之間「元祐復賦」的「元祐法」被奉為南宋考賦定式，其中編成的輯錄北宋諸家考場賦特別是「元祐賦」又被奉為最佳摹習藍本。如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卷 1「止齋陳氏」條在言述陳傅良「用詩賦取科第」而為「中興冠」後又謂其賦作：「工巧特甚，稍失《三元衡鑒》正體。」考《三元衡鑒》，或稱《三元元祐衡鑒賦》，甯宗慶元 5 年曾頒佈以為舉子矜式，陳謙有謂「舉子詞賦，固不敢望如〈三都〉，得如《三元元祐賦》足矣」，<sup>42</sup>然作為「中興冠」的陳傅良賦作尚有「失《三元衡鑒》正體」，可見《三元衡鑒》其在舉子眼中的地位。所謂「三元」，指宋代科舉以發解試、省試、殿試第一名之合稱，宋人趙昇《朝野類要》卷二〈舉業·三元〉有詳細記載，而《三元元祐衡鑒賦》書已佚，但據王清臣《揮塵餘話》記述「吳伯固編《三元衡鑒》」語，<sup>43</sup>可知吳處厚曾編纂（至少是參編）此書，而吳氏於北宋末享有賦名，《宋史》本傳記有「蔡確嘗從吳處厚學賦」事，其選賦編賦自然是行家。至於《三元元祐衡鑒賦》中究竟有多少「元祐復賦」時

<sup>39</sup>〔元〕Yuan 虞集 Yu Ji：《道園學古錄·廬陵劉桂隱存稿序》*Daoyuan xuegu lu: Luling Liu Guiyin cuncao xu*（明嘉靖四年陶諧、虞茂刻本）卷 33。

<sup>40</sup>〔元〕Yuan 脫脫 Tuo Tuo：《宋史》*Songshi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85 年）卷 450。

<sup>41</sup>參見〔宋〕Song 李心傳 Li Xinchuan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*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*（北京[Beijing]：中華書局[Zhonghua shuju]，1956 年）卷 15。

<sup>42</sup>〔清〕Qing 徐松 Xu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·貢舉雜錄》*Songhuiyao jigao: gongju zalu* 卷 5 之 21。

<sup>43</sup>〔宋〕Song 王明清 Wang Mingqing：《揮塵餘話》*Huizhu yuhua*，見〔元〕Yuan 陶宗儀 Tao Zongyi：《說郛》*Shuofu*（上海[Shanghai]：上海古籍出版社[Shanghai guji chubanshe]，1988 年）卷 39。又，〔宋〕Song 吳曾 Wu Zeng：《能改齋漫錄》*Nenggaizhai manlu*（聚珍版叢書本）卷 14，〈類對·忘楫遺弓之句〉有〈三元衡鑒賦〉的記載。

的場屋賦作已不清楚，但從南宋間士子對「元祐賦」的追奉，特別是對蘇東坡賦的讚譽，亦可於中窺覘「元祐賦」風尚中的賦用指涉與對乾、淳賦風的影響。

首先，賦重詞章，亦重才學，既有熔鑄經史之實，又有駢四儷六之巧，為「元祐」之典範。試觀蘇軾在元祐復賦期間感奮而自創〈復改科賦〉：<sup>44</sup>

殊不知采摭英華也簇之如錦繡，較量輕重也等之如錙銖。韻韻合璧，聯聯貫珠。稽諸古其來尚矣，考諸舊不亦宜乎！（此駁斥「事吟哦者為童子，為雕篆者非壯夫」之論而贊詞章之麗）

字應周天之日兮，運而無積；苟合一歲之月兮，終而復始。過之者成疣贅之患，不及者貽缺折之毀。曲盡古人之意，乃全天下之美。遭逢日月，忻歡者諸子百家；抖擻曆圖，快活者九經三史。議夫賦曷可已，義何足非？彼文辭汜濫也，無所統紀；此聲律切當也，有所指歸。巧拙由一字之可見，美惡混千人而莫違。正方圓者必藉於繩墨，定隳括者心在於樞機。（此讚美賦兼才學以明進士賦之妙道）

作為元祐權知貢舉者，蘇軾以賦體讚美科場進士賦，所述內涵及要求，也是對元祐復賦的期許與指導。這一思想為乾、淳學者所繼承，誠如朱熹論文以為「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，只是平易說道理」，<sup>45</sup>平實言理，也自然成為場屋賦的示範。

其次，經義命題與經賦關係的融織，這是「元祐」賦依循中唐以來考賦「經義題」的實踐。自漢人獻賦承緒「古詩之流」（班固〈兩都賦序〉），用經取義，為一傳統，迨至唐宋考賦，經、賦之爭，歷久而未息，於是用經義命題與元祐分科（經義與詩賦），皆權宜之法。其中經義命題，雖已行於中唐之世，如阮亨《律賦經畝集·凡例》說：「應制之賦以經命題，昉自有唐，如裴晉公〈歲寒知松柏後凋賦〉、韓文公〈明水賦〉、李供奉〈明堂賦〉、元僕射〈鎮圭賦〉、白尚書〈性習相近遠賦〉」，<sup>46</sup>然科場規定經、史、

<sup>44</sup>〔宋〕Song 蘇軾 Su Shi:《東坡全集》*Dongpo quanji* (明末文盛堂刻本，現藏上海圖書館)卷33,〈復改科賦〉“Fu gai ke fu”。

<sup>45</sup>〔宋〕Song 朱熹 Zhu Xi:《朱子語類·論文》*Zhuzi yulei: Lunwen*(北京[Beijing]:中華書局 [Zhonghua shuju], 1986年)卷140。

<sup>46</sup>〔清〕Qing 阮亨 Ruan Heng:《律賦經畝集》*Lüfu jingshe ji*(清道光19年揚州二西堂藏板)。

子命題，並「書經史所出，模印給之」（《石林燕語》卷8），至仁宗景祐後漸趨嚴格，特別是「經題」日多，使「學者無不遍讀《五經》，其對元祐賦的影響以及經典的重塑，有重要意義，讀乾、淳時期科場賦（如前舉樓鑰的作品），其間的傳承是顯而易見的。

再者，彰顯於元祐間的蘇軾律體賦「以策論手段施之帖括，縱橫排戛，仍以議論勝人」，但卻能貫珠合璧，取喻經義，「寓議論於排偶之中」而「工麗絕倫」，<sup>47</sup>既是一種創作革新，又成為一種範式，為乾、淳賦家所繼承。當時文章推尊歐、蘇，是為風氣，如吳子良《荊溪林下偶談》卷三：「淳熙間，歐文盛行，陳君舉、陳同甫尤宗之。」<sup>48</sup>而賦創作如陳傅良〈漢鑿瑀為樸賦〉擬仿歐公〈鑿雕為樸賦〉實亦明顯。相比之下，時人仿蘇賦現象更為突出。蘇賦的典範性在於不僅繼歐陽修創制了自由體的新文賦如〈赤壁〉、〈秋陽〉、〈黠鼠〉等，而且在大力宣導並參與元祐復賦的同時，寫作了大量的科舉八韻賦（今存7篇），其中如〈明君可與為忠言賦〉（以「明則知遠，能受忠告」為韻）、〈通其變使民不知倦賦〉（以「通物之變，民用無倦」為韻）、〈六事廉為本賦〉（以「先聖之貴，廉也如此」為韻）等，均為「寓議論於排偶」的佳構。這又延伸到另一問題，就是乾、淳時對「元祐」文風的追摹集中於對「蘇文」的仿效。如趙彥衛《雲麓漫抄》卷8云：「淳熙中，尚蘇氏，文多宏放。」究其因，一在王者偏嗜，如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甲編卷2《二蘇》載：「孝宗最重大蘇之文，御制序贊，特贈太師，學者翕然誦讀。所謂『人傳元祐之學，家有眉山之書』，蓋紀實也。」一在文士崇尚，如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八載：「建炎以來，尚蘇氏文章，學者翕然從之。……有語曰：『蘇文熟，吃羊肉；蘇文生，吃菜羹。』」其中一重要內涵，即科場競技之需，所以朱熹批評呂祖謙「留意科舉文字之久，出入蘇氏父子波瀾」。<sup>49</sup>由此批評又可反證蘇文在當時之流行。

為了樹立創作典範，就賦域而言，乾、淳間兩部文學總集的整理與編纂，是值得珍視的。一是淳熙6年呂祖謙進《聖宋文海》，孝宗賜名《文鑒》，<sup>50</sup>即今之《宋文鑒》的編纂。二是淳熙8年尤袤完成了《昭明文選》

<sup>47</sup> [清] Qing 李調元 Li Diaoyuan:《賦話》Fuhua 卷5, 見《函海》(清乾隆綿州李氏萬卷樓刻嘉慶14年, 李鼎元重校印《函海》本, 現藏浙江圖書館)。

<sup>48</sup> [宋] Song 吳子良 Wu Ziliang:《荊溪林下偶談》Jingxi linxia outan 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。

<sup>49</sup> 引自[宋] Song 朱熹 Zhu Xi:《朱子語類·與張敏夫》Zhuzi yulei: Yu Zhang Mingfu 卷31。

<sup>50</sup> 詳見[清] Qing 徐乾學 Xu Qianxue:《資治通鑒後編》Zizhi tongjian houbian (文淵閣四



的刻印工作，袁說友有題記謂「（尤公）閱一歲有半而後成。……《文選》以李善本為勝，尤公博極群書，今親為校讎，有補學者，是所謂成民而致力於神者」。<sup>51</sup>蕭統編《文選》，首列賦章，且分為 15 類，被後世奉為辭賦創作之圭臬，而南宋科場繼前此兩度罷賦，為適應科場重新考試之需，故有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卷 8 所記「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」之說，尤刻《文選》的完成，宜為文制所需，供士子效仿為賦的善本。如果說《文選》賦篇為舉子場屋競賦提供了效仿之遠源，那麼，《宋文鑒》的編纂及其中的北宋賦篇，其中尤以「元祐」為重鎮，誠為當時士子科場效仿之近源。而呂祖謙編《宋文鑒》之「賦篇」（共 11 卷）與北宋初所編纂的兩部唐代文章總集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唐文粹》一大區別則在，《英華》收賦皆律體，《文粹》專收古體，《文鑒》則兼收古、律（前 10 卷為古體，第 11 卷為律體）。其中北宋律賦收錄王曾等 18 篇為榜樣，每位作家一篇，包括時風所尚的歐陽修賦 1 篇（即〈應天以實不以文賦〉）、蘇軾賦 1 篇（即〈濁醪有妙理賦〉）；至於古體賦（包括駢體與新文賦體）的收錄，多數是一人一篇，或則兩篇，如歐陽修的〈鳴蟬賦〉、〈秋聲賦〉（見卷 3），惟獨蘇軾一人收錄多達 7 篇，分別是〈灑澗堆賦〉、〈屈原廟賦〉、〈昆陽城賦〉、〈赤壁賦〉、〈後赤壁賦〉、〈秋陽賦〉、〈中山松醪賦〉（見卷 5）。這又給我們兩點啟示：

其一，律體賦為科場所用，但舉子習賦取徑要寬，取法古體賦，以「古」為「律」，才是取法乎上，乾、淳場屋賦以律體騁詞采，明經義，發議論，正源於此。

其二，從尤刻《文選》與呂編《文鑒》，可以看出陸游所記述時語「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」與「蘇文熟，吃羊肉」皆緣於文制，是當時科場競技詞章之學的兩大「法寶」。

#### 四、批評：應用與反思

當我們將視域置放乾、淳科場競技賦創作之時，也不能忽略場外文人賦創作對文制變遷的作用與影響。而科場賦與文人賦的創作思想有時是對立的，有時又是相容的，這表現於對科場賦的態度。例如前揭朱熹批評呂

庫全書本）卷 125。按：葉紹翁《四朝聞見錄》記載：「東萊呂成公祖謙，集《皇朝文鑒》既成，孝宗錫名《文鑒》，除公直秘閣，暨賜御史府金帛。」

<sup>51</sup>〔宋〕Song 袁說友 Yuan shuoyou：《東塘集·題梁昭明太子文選》*Dongtang ji: Ti Zhaoming taizi Wenxuan*（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卷 19。

祖謙「留意科舉文字之久」，創作擬效騷體且奉「西京」賦為「上乘」，明顯在於鄙夷科場律體。不同的是，楊萬里曾批評唐、宋科場詩賦題拘忌於政教而日益褊狹云：「自〈日五色〉之題一變而為〈天地為爐〉，再變而為〈堯舜性仁〉，於是始無賦矣。自〈春草碧色〉之題一變而為〈四夷來王〉，再變而為〈為政以德〉，於是始無詩矣。非無詩也，無題也。」<sup>52</sup>同時，又對考試程文之技巧及禁忌，卻十分注意。孫奕《履齋示兒編》卷9〈聲畫押韻貴乎審〉記載云：「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，同僚有取《易》義為魁，先生見卷子上書『盡』字作『尽』，必欲擯斥。考官乃上庠人，力爭不可。先生云：『明日揭榜，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個尺二（謂析盡字）秀才，則吾輩將胡顏？』竟黜之。」這顯然本著考場競技鬥藝由合格到精美的原則，而表現出的對科場賦的容受。

從另一視域即文人賦創作來看乾、淳賦風，則突出表現於騷情與理趣的融織，楊萬里與朱熹的賦作可為典例。如楊萬里的〈中秋月賦〉於傳統的「悲秋」情境中寫景懷人，卻能超脫歷史上同類題材的陳套，以「我」（客）與「月」（主）之「邂逅」，觸發情思，轉出「悲秋豈其達人兮，愛月乃我輩事」的理境。又如其《歸歎賦》寫客舍夢歸：「栩栩以一適兮，忽乎還家而及門；忘予身之為羈兮，驟喜覩予之親。……環兒女之挽須攬袖兮，犬雞亦為之載欣。予親呼酒以予酌兮，奚未舉而既失。」羈人騷客的離情別緒，托諸夢境，議論之中，又見曠達之懷，同樣地表現出對蘇軾賦襟抱的取挹。朱熹的〈感春賦〉雖然沒有超脫「樂吾之樂兮，誠不可以終極；憂子之憂兮，孰知吾心之永傷」的內心苦悶，然從其全賦描繪之間居心境來看，又能轉騷情，出哲思，於虛靜靈曠間透泄出「納遐情於方寸」，而「獨有會于余心」的自適情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朱熹一方面批評呂祖謙困於場屋文而「出入蘇氏父子波瀾」，而另一方面又曾與傅自得登山泛湖，或「擊楫而歌楚騷」，或「誦東坡先生〈赤壁〉前後賦和之」（傅自得〈金溪夜泛記〉），同樣表現出對蘇氏文風的向慕，並沒有超脫「小元祐」文風的時代面貌。

可以說，這種科場賦與文人賦並存的現象，一直延續到宋末，前者是在考場內舉子程文習慣性的延續，後者因宋末世變，更突現其憤世、憂世

<sup>52</sup> [宋] Song 楊萬里 Yang Wanli:《誠齋集·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》Chengzhai ji: Zhouziyi xunmeng shengti shixu (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，卷83。

的騷人情懷。而結合上述科場賦與文人賦，又形成南宋後期賦學批評的兩個走向：

一是對賦應用性技巧的重視，這限於場屋文學。乾、淳之後，雖又經歷了短暫的「慶元黨禁」，政治對文學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，然科場用賦則沿習制度，特別是理宗朝對文禁的解束，士子對乾、淳包括科舉賦在內的中興文風之推崇又成一時風尚。由於乾、淳文學中興引起後續者的心摹手追，催生了一批有關作賦示範類的批評撰述，今存孫奕的《履齋示兒編》卷7、卷8〈文說〉中有關場屋賦的論述，鄭起潛指導科舉八韻賦創作的《聲律關鍵》，成為南宋時期極珍貴的賦學批評文獻。然而不可諱言，儘管這類賦學批評雖然也重視義理內涵與審美趣味，但由於科場賦長期的承襲而對賦學的傷害，使其批評更多地體現於授之以法的「韻律」、「句法」、「謀篇」等文戰技巧。如論「韻律」：

秦少遊〈君臣相正國之肥賦〉第五韻云：「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，難以成乎安強。正臣而事邪主者，不能浸乎明昌。美聖時之會聚，當直道以更相。蓋上下交孚兮，若從繩之糾畫。故民俗阜蕃也，常飽德以康彊。……」系中魁選。有訟其重疊用韻，遂殿舉朝旨，今後詩賦，如押安強，即不可押康彊矣。蓋十陽韻中強字亦作彊故也。<sup>53</sup>

又論「句法」：

何謂琢句？前輩一聯兩句，便見器識。如〈有物混成賦〉云：「得我之小者，散而為草木；得我之大者，聚而為山川。」知其有公輔器。如〈金在鎔賦〉云：「儻令分別妍媸，願得軒鑿；如使削平禍亂，請就干將。」知其出將入相。賦限三百六十字以上，豈可輕下語耶？造句不一，四六為工，八字句尤典雅。<sup>54</sup>

或教童蒙習賦，或示科場津筏，雖宣導器識，實流於技藝。與當時文人賦振發騷情相比，科場律賦鬥巧爭奇，摹習癩祭，使宋賦日益走衰，其中程文難辭其咎。文天祥在宋末為朱時叟《八韻關鍵》題序云：「由今視乾、淳

<sup>53</sup>〔宋〕Song 孫奕 Sun Yi:《履齋示兒編·協韻雖亦作字不可重押》Luzhai shi'er bian: Xieyun sui yi zuozhi buke chongya (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卷8。

<sup>54</sup>〔宋〕Song 鄭起潛 Zheng Qiqian:《聲律關鍵》Shengli guanjian (清宛委別藏本)·〈五訣〉wu jue 之4〈琢句〉“Zhuo ju”。

以為古，由乾、淳視《金在鎔》、《有物混成》等作又為古。……然國家以文取人，亦隨時為高下，雖有甚奇傑之資，有不得不俯首於此。」<sup>55</sup>無奈語中，頗具反省意味。

一是對古賦的尊奉，特別是祖騷宗漢思想的出現，這與乾、淳時期文人賦創作的導向一致。例如朱熹作賦好為騷體，與他編纂《楚辭集注》與《楚辭後語》關係密切。考察朱子所編，有兩個直接源頭，即自己編的《詩集傳》和晁補之編的《續楚辭》、《變離騷》，前者決定其以《詩》衡「賦」，歸於「賦者，古詩之流」（班固〈兩都賦序〉）的本原意識，故發為賦宜「不失古詩之六義」的論述；後者傳述自宋祁「《離騷》為詞賦祖」<sup>56</sup>說，傳承宋代如蘇軾、晁補之、黃伯思、洪興祖諸家解讀《楚辭》的理論譜系，而宣導「古賦須熟看屈、宋、韓、柳所作，乃有進步處」。<sup>57</sup>出此「風騷傳統」，楊萬里又據以批評考試律賦之「聲病」嚴格，所謂「吟詠情性，當以《國風》、《離騷》為法，又奚《禮部韻》之拘哉！」<sup>58</sup>由「祖騷」而發「宗漢」之論，是南宋賦學批評一重要走向。如項安世就曾說：「自屈、宋以後為賦，而二漢特盛，遂不可加。唐至於宋朝，復變為詩，皆賦之變體也」而究其原因，又在於「讀漢人之賦，鋪張闡麗，唐至於本朝，未有及者。蓋自唐以後，文士之才力盡用於詩」。<sup>59</sup>南宋尊崇古賦的批評，對元人賦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，從而構建起賦論史上最鮮明的「祖騷宗漢」批評體系。如論「古賦當祖何賦」，必謂「屈原為騷，漢儒作賦」；<sup>60</sup>祝堯《古賦辨體》承朱熹以《詩》之「六義」衡「賦」之法，強調「古今言賦，自騷以外，咸以兩漢為古。……心乎古賦者，誠當祖騷而宗漢」，<sup>61</sup>其批評對象一在唐宋考

<sup>55</sup> [宋] Song 文天祥 Wen Tianxiang:《文山集·八韻關鍵序》*Wenshan ji: Bayun guanjian xu* (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) 卷 13。

<sup>56</sup> [元] Yuan 祝堯 Zhu Yao:《古賦辨體·楚辭體上》*Gufu bianti: Chuciti shang* 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 卷 1。

<sup>57</sup> [宋] Song 魏慶之 Wei Qingzhi:《詩人玉屑·晦庵論楚辭》*Shiren yuxie: Hui'an lun chuci* (文淵閣四庫全書本) 卷 13。

<sup>58</sup> [宋] Song 羅大經 Luo Dajing:《鶴林玉露》*Helin yulu* (明萬曆 29 年，復西齋刻本) 卷 6 引。

<sup>59</sup> [宋] Song 項安世 Xiang Anshi:《項氏家說·詩賦》*Xiangshi jiashuo: Shifu* (叢書集成初編) 卷 8。

<sup>60</sup> [元] Yuan 袁桷 Yuan Jue:《清容居士集·策問》*Qingrong jushi ji: Cewen* (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) 卷 42。

<sup>61</sup> [元] Yuan 祝堯 Zhu Yao:《古賦辨體·兩漢體序》*Gufu bianti: Lianghanti xu* 卷 3。

場律賦，一在宋代自由體文賦，顯然又與文制的變遷相關。然而最有意味的是，元人承南宋文人賦批評重騷、漢之傳統，卻轉而將「祖騷宗漢」之理論指導的創作實踐納入科舉文場，開啟進士考賦「變律為古」，即以古體賦作為科場文戰程文的特殊時代，其間的成敗得失，則又成為辭賦創作風貌及批評因世變而改變的另一新問題。

【責任編校：林俶萍】

## 主要參考文獻

### 古籍

- 馬端臨 Ma Duanlin：《文獻通考》*Wenxian tongkao*（清浙江書局本）。
- 王應麟 Wang Yinglin：《玉海》*Yuhai*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。
- 李燾 Li Tao：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*Xu zizhi tongjian changbian*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。
- 徐松 Xu Song：《宋會要輯稿》*Song huiyao jigao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，1957 年影印本。
- 鄭起潛 Zheng Qiqian：《聲律關鍵》*Shenglü guanjian*，阮元 Ruan Yuan 輯：《宛委別藏》*Wanweibiecang* 本，南京 Nanjing：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，1988 年。
- 浦銑 Pu Xian：《歷代賦話續集》*Lidai fuhua xuji*（清乾隆 53 年刻本）。
- 樓鑰 Lou Yue：《攻媿集》*Gongchou ji*（武英殿聚珍版）。
- 李調元 Li Diaoyuan：《賦話》*Fuhua*（清涵海本）。
- 脫脫 Tuo Tuo：《宋史》*Songshi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，1985 年。
- 李心傳 Li Xinchuan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*Jianyan yilai xinian yaolu*，北京 Beijing：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，1956 年。
- 祝堯 Zhu Yao：《古賦辨體》*Gufu bianti*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。

### 近人論著

- 鈴木虎雄著、殷石隴 Yin Shiqu 譯：《賦史大要》*Fushi dayao*，南京 Nanjing：正中書局 Zhengzhong shuju，1942 年。

馬積高 Ma Jigao :《賦史》 *Fushi* , 上海 Shanghai :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, 1987 年。

## 審查意見書

### 第一位審查人

南宋孝宗乾道（1165-1173）、淳熙（1173-1189）二十餘年之間，由於政局安定，隨著政治上的「乾淳中興」，文學也出現了中興的新局，無論詩學、賦學，皆有可觀的成績。然而學者大多著力於詩學中興之探究，對於辭賦中興之論述並不多見。本文著力於此，深入探討剖析乾淳文制變遷與辭賦風尚，可以彌補上述之不足，就選題而言，值得肯定。

作者對於第一手文獻資料的掌握與獨具隻眼的辨析能力令人佩服，所得的研究成果，無論就宋代文學史或辭賦史而言，都有相當高的學術參考價值。

### 第二位審查人

向來論述兩宋辭賦創作多以文賦為主流，難免忽略其他辭賦風尚的發展與重要性。本文針對南宋律賦立論，以科舉考試的歸復與推崇為考察，剖析南宋乾熙年間文制變遷與辭賦風尚的關係。一來彰顯文賦之外，乾道與淳熙時期律賦大量創作的現象；二則闡釋其影響，亦即樹立了辭賦創作典範，其中包括了歐（陽修）、蘇（軾）賦以及賦壇「乾淳體」的典範確立。從律賦創作來看，本文突顯不應只重視唐律賦的研究現況。就辭賦發展而言，則突破宋賦僅有文賦創作的刻板論斷。難得的是，本文並不採用辭賦本文分析的進路，轉從制度層面，也就是科場罷賦、復賦的文制變遷，尤能彰顯辭賦創作的時代意義，強化辭賦文體研究的重要性。凡此均見本文作者深厚之辭賦研究實力，值得推薦。

